

回忆 阿登纳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安纳丽丝·波萍迦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回 忆 阿 登 纳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安纳丽丝·波萍迦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neliese Poppinga
Meine Erinnerungen an
Konrad Adenauer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1971

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加特
德意志出版社 1971 年版译出

回 忆 阿 登 纳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安纳丽丝·波萍迦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译

上 海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 字数 236,000
1976 年 7 月第 1 版 197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158 定价: 1.20 元

内 部 发 行

译者说明

本书作者安纳丽丝·波萍迦 1958 年起至 1967 年阿登纳去世止，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秘书，历时达十年之久。阿登纳去世后，她继续致力于阿登纳政策思想的研究，现任西德“康拉德·阿登纳之家基金会”负责人。

全书共分八章(原书只有标题，章次是我们加的)，作者主要记叙了 1963 年 10 月阿登纳下台后到 1967 年 4 月去世前这一期间他的经历和活动。本书也介绍了阿登纳的家世、一生经历、谈吐爱好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阿登纳的思想、观点及其政见。

全书基本上根据阿登纳下台后撰写回忆录和继续为基督教民主联盟工作这两方面内容穿插写成的。作者介绍了阿登纳写回忆录的动机、态度和方法，还反复叙述了他对处在苏联威胁之下的西欧包括西德在内的安全的忧虑，担心继任者艾哈德的对外政策失灵，并时刻不忘欧洲的联合。因此他虽然已经下台，但仍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他的政见。例如，他在集会演说、接见记者谈话和与戴高乐、尼克松、腊斯克、艾奇逊等人的会谈中，一再阐明他对世界政局、美苏政策、德国重新统一、美欧关系、德法友谊以及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其中也谈到了西德的内政问题和党派斗争等情况。

四卷本《阿登纳回忆录》主要记述阿登纳下台前的经

历,而本书则侧重反映他下台后的活动,因此本书似可作为四卷本《阿登纳回忆录》的一个补充。

本书由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部分同志翻译。

1976年3月

说 明

康拉德·阿登纳在他去世的那一年中曾经一再表示,想把自己作为联邦总理引退后的这段时间的活动,也收入他的回忆录。他说,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很多,他认为非常重要,一定得记载下来。如今,这一点他再也无法做到了。这段时间内使他有感于怀的事情,不少都是我听到他说的或者从侧面看到的。我感到有义务将它们记述下来,并借此试图实现康拉德·阿登纳的一份心愿。

安纳丽丝·波萍迦

1970年2月于勒恩多夫

目 录

说 明(安纳丽丝·波萍迦)

第一章	惜别·····	1
第二章	过渡的岁月·····	57
第三章	“做出新的开端,为时始终不晚”·····	91
第四章	卡德纳比亚·····	149
第五章	1964 年的秋冬·····	208
第六章	九十岁·····	248
第七章	彼岸·····	339
第八章	最后一次盛大旅行之前·····	379

第一章 惜 别

1963年10月18日,星期五,时近黄昏,夜幕已经开始降临,来因河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纱。康拉德·阿登纳身穿大衣,手中拿着帽子和他那根散步用的手杖,缓步走在绍姆堡宫^①二楼他的办公室里。过去的十四年,他曾和这些房间朝夕相处,现在他要向它们告别了。他的继任者、新当选的联邦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同僚们提醒大家说,现在该可以搬进去了。必须承认,从10月15日起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天,而时间确实紧迫。开始有一种说法,根本不用匆匆忙忙,应该让人家从从容容地搬到联邦参议院的侧屋去,别让联邦总理以为人家在撵他走。

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德国联邦议院议会党团将联邦参议院侧屋的房间作了精心布置,这是康拉德·阿登纳1948、1949两年担任议会委员会^②主席时工作过的地方。人们不惜精力给前政府首脑安排了一个体面的办公室,好让他待在里面也能称心如意。他的办

① 绍姆堡宫(Palais Schaumburg)在波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总理府即设在此。——译者

② 议会委员会(Der Parlamentarische Rat),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前的制宪机构。——译者

公室四周装有护壁板,里面是壁橱,今后写回忆录用的资料无疑都藏在橱里。室内的家具都是他亲自挑选的。

对于拟定给他的这间办公室的现貌,康拉德·阿登纳只是在10月15日联邦议院全体大会举行告别仪式前不久,才匆匆忙忙看过一次。有一张他的照片:他坐在新办公桌前,略带一点尴尬的神色看着光溜溜的桌面。气氛冷冰冰的。这里还没有生气,只有新闻记者围着他,用照相机聚精会神地把老人呆滞的动作拍摄下来。

最后一批工匠于10月14日很晚完工,过了10月15日才开始乔迁。根据联邦总理的意思,在他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幅温斯顿·丘吉尔作的画,这是丘吉尔在几年前送给他的礼物。画面上是一座希腊神殿的遗址,背景是蔚蓝的天空。这幅画左右两边各挂着一幅古老的罗马铜版画,那是他的朋友阿尔西德·德·加斯佩里^①送的。此外,联邦总理还叫人把他勒恩多夫^②家里餐厅的一幅荷兰风景画也取来,挂在这儿的墙上。这幅画的下面,是一排他将来举行会谈用的椅子。一条西班牙出品的手织地毯给房间带来了暖意,这也是他的私人财产。然而,决定这个房间气氛的却是两样东西:一是1951年内阁为祝贺联邦总理七十五岁寿辰送的一尊贵重的十四世纪木雕——怀抱孩子的圣母。这些年来,这尊约一米高的雕像一直摆在绍姆堡宫他的办公室里,现在也迁入了新居。

① 阿尔西德·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 1881—1954), 1944年至1953年期间多次出任意大利总理和外长。——译者

② 勒恩多夫(Rhöndorf), 波恩市郊地名, 位于来因河右岸, 阿登纳家在此。——译者

再就是雕像旁摆的一只漂亮的大地球仪，这是他八十寿辰时收到的贺礼。有了地球仪和圣母雕像，房间顿时显得生气盎然，给人以安家久居之感——这既是过去生活的一页，又是连接现在生活的一页，也是离别绍姆堡宫后过渡生活的一页。

对联邦总理来说，绍姆堡宫曾经是他的另一个家。每天一清早他就来了，直到很晚才回勒恩多夫寓所去。他就在这里进行政务工作，和自己党内的同志们商谈，同联合执政的伙伴们争得面红耳赤，跟他的朋友罗贝尔·舒曼、阿尔西德·德加斯佩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夏尔·戴高乐会谈。在这里，他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肯尼迪总统举行过谈判，与苏联大使斯米尔诺夫及其同胞米高扬进行过唇枪舌战。那是一个战斗的岁月，而他确实是乐于战斗的。他常说，没有战斗他会感到生活无聊乏味。当然他立即又会加上一句，如果斗输了，那是痛苦的，战斗本来就带有这种风险。不过要是斗赢了的话，那就真叫人高兴。

他的党内的朋友们了解这种观点，因此想到今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单是考虑到他和他的继任者关系并不融洽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们感到惶恐不安。诚然，联邦总理在他 1963 年 10 月 15 日向德国联邦议院所作的告别演说中，谈过自己今后怎样过日子：“……我打算多听少说，……一个人不应讲得太多，话讲多了不值钱。只有非讲不可和确信不能不讲时，才应该讲。”他的党内朋友们肯定会担心地提出这个问题：他会老是确信自己一定得讲吗？他这次演说的稿子最后一页写道（他没有照本宣读）：“感

谢诸位，感谢德国人民，我将把我的精力献给德国人民，直至最后一息。”如果他看到有危险，他将站出来说话。

联邦总理信步走在绍姆堡宫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最后一次检查了那座古老珍贵的落地大钟是否开了发条，瞧瞧自己办公桌后面墙上的那幅风景画，看看窗子对面墙上的十七世纪画像，也望望花园里的高大树木。“到了联邦大厦那边，不容易看到外面的景色了，”他这样说，“不过来因河的一段景色我还是能看见的。”

在绍姆堡宫度过的岁月中，他工作无比繁忙，责任重大，但他乐于这样。可是现在呢？“联邦总理引退”后的生活将会怎样呢？他仍旧是联邦议院议员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以这样的身分，他是可以对政策施加影响的。他对我说：“我会有办法维护我的联邦议院议员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权利的，我会和大家一道设法执行一种明智的政策！”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比他可能想象和希望的困难得多。

不过，联邦总理一开始还是打算“多听少说”，这是他10月15日演说时讲的，而且他也多次强调过这一点。在一次接见电台记者的谈话中他说：“我打算研究十四年来议会政治的发展情况，而且是坐在议员席上研究；同时也将根据情况……积极地站起来讲话，不过只是在情况特殊的时候。”

所谓“情况特殊”是指什么呢？他怎样进行政治活动？1963年10月15日前后，人家一再问起他的未来打算，例如10月8日的一次电视谈话中就有人问过他：“您当政那么久，历时十四年……现在您干什么呢？”——“这

是个问题，我自己也正在考虑哩！”他开始回答了，“要说我干什么，一部分将由我的党和我的议会党团决定。你们知道，联邦参议院大厦侧屋那边已经给我安排了几间房子，好让我在那里工作，可也是为了把我抓住不放。所以说，今后我当然要继续尽我的能力考虑提出我的政见。至于我利用这些政见派什么用场，那要取决于人家对我的要求。我决不强加于人，而是听从调配。我这样做并非出于无奈而进行抵制，相反，我是想在能够帮忙的地方，给今后的联邦政府帮忙。我只希望人家要求我这样做，以免落得个强加于人的名声，因为这不合我的本意，也是不正确的。”

“……我强加于人！”他曾经担任过十四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他的名字和坠入深渊之后又重新崛起的我国人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使我们德国人再度赢得了国外的信任。靠了他，德国的名字重新受到别人尊敬。在星期五这一天，当这个人向他的工作地点道别时，该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啊？

他几乎一言不发，慢步下楼，沿着长长的过道走去。看门人泪汪汪地立在过道口。联邦总理府的一些官员和职工知道，康拉德·阿登纳现在要离开绍姆堡宫了，今后不再是这儿的主人和他们的上级了。大门口的警卫向他敬礼，保安官员山德尔打开了车门。他的司机赛贝特先生亲切地将一条咖啡色毛毯盖在老先生的膝上。随后，他的这辆从10月15日起调换了新牌照的汽车，驶离了绍姆堡宫这个地方。

1958年7月12日，一个仲夏的星期六午后，海风阵阵送爽，园中玫瑰香气袭人。我待在特拉弗明德^①母亲身边，与家人团聚。桌上的咖啡和蛋糕散发出诱人食欲的芳香。我在日本待了三年，在东京担任汉斯·克罗尔博士大使的秘书，而现在呢？我可以享受德国生活的乐趣了。忽然一辆邮车在我家门口停住，跳下来一名邮递员，顿时我们全家的宁谧气氛被破坏了：一份电报。是谁的电报？我怎么会有电报？我急忙撕开封套，发电人：波恩外交部。我惊奇地念着电文：“请于星期一（7月14日）或星期二（7月15日）来波恩见联邦总理先生。报到日期立即电告外交部。”我笑了笑，随即就变得严肃起来。今天是星期六，岂不是两天之内就得到波恩吗？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电报递给母亲看，越想越摸不着头脑。去见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什么事情？干吗偏偏叫我去？岂非咄咄怪事。可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见过埃及的金字塔，见过曼谷密如蛛网的运河，见过马尼拉的原始森林，干吗不可以去见见康拉德·阿登纳呢？我当然要去，就乘明天星期日的夜车走。我倒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好奇心动起来了，我那乐于冒险的兴致按捺不住了。

我进绍姆堡宫啦！想到这里我连连摇头：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荣誉呢？我们全家凑在一起考虑，其中会有什么文章。“现在先认真想一想，”我的兄弟这样说，“实实在在地考虑考虑！”倘使叫我进政府首脑秘书室的话怎么

^① 特拉弗明德(Travemünde)，位于西德北部波罗的海海滨，靠近卢卑克。——译者

办？——叫我去？进政府首脑秘书室？想法何其荒谬！再说我也根本不想去！我想再出一次国，干它两年，再久也不要了。我要给自己攒一笔钱上学，而国内的待遇是没有那么优厚的。攒了钱我就上大学去，自己之所以参加工作，本来就只是为了攒钱读书嘛。1949年我高中毕业，当时正值币制改革^①后半年左右。我没钱升学，根本未能接受职业训练。这种情况又何尝只我一个，我同班的女同学大部分不得不去工厂当工人挣钱。我去了英国，在英国当“家庭保姆”，一边学习英语，同时还学速记和打字，偶然被我们驻伦敦大使馆雇用。但我到底缺少基本训练，这使我感到闷闷不乐。只会速记打字，单凭运气和间或有点小聪明，我认为一生一世是不够用的。我想升学。为了挣钱读书我才去东京。再说我对东亚也很感兴趣，因此如果要我进首脑秘书室工作，那是完全办不到的。何况我对政治实在不感兴趣，我的兴趣是历史，而不是现实政治。我不想过问现实政治。

有些人曾经相信人们关于祖国和荣誉所讲的一套，说什么有人存心不让我们得到每日的粮食啦，也不让我们中国人民有土地啦。我原来也是相信这种说法的人。这对我们确信诚实，笃信真理，对青年人勇于献身的精神，对人民和祖国的概念以及义务和忠诚，该是多大的侮辱啊。当我听到有人以德国的名义所干下的勾当时，我大吃一惊，当时我十六岁。我还记得，1945年5月8日投降后，我第一次听人家谈起有集中营，谈起犹太人遭到的侮辱

① 指1948年6月18日，美英法三占区实行单独的币制改革。——译者

以及德国人对德国人犯下的罪行。当时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策略,意在肃清居民对希特勒的信仰。后来我同一名囚犯谈过话——此人曾经帮助我的一个表姊妹从俄国人那里逃出来,他俩现在结了婚——,才知道确实有这种事。这实在令人震惊,有此同感的不只我一个。

那么搞政治吧?不干!在以后的这些年里,我尽量使自己不去注意政治。我感到1945年以后我们施行的民主政治是好的,我赞成它的基本原则,对它的成就表示钦佩。可是我觉得政治乃是专家们的事,作为小小百姓有些事情实在看不透。报纸上登载的东西难道可以尽信吗?不,我是不信的。此外我以为把时间用于政治未免太可惜。至于说到选举,是的,我在东京的确首次投过票,投了康拉德·阿登纳的票,因为我在东京任职期间,登记的住址是波恩。康拉德·阿登纳是波恩选区的代表,而且我也认为他的施政方针很好。这是选举义务嘛!看来事情固然如此,我不能不履行选举义务。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别的事谈不上。

不,我与政治生性无缘,我的兴趣在别的方面。我深受日本的感染,向往远东的文化。只有佛教、神道教^①、中国和日本的艺术才是我的兴趣所在。而欧洲呢?待在这里我再也不感到舒服了。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粗俗,那么迟钝,那么缺少美的感受。这里事事都是那么讲求实利主义,样样华而不实。大家把时间耗费在虚有其表的

① 神道教(Shintoismus)为日本国教。——译者

事情上,生活就是为了一辆汽车、一幢房子、漂亮的衣着。至于为根本的东西、为我们世界的美好而生活,这种思想我感到这里已经丧失殆尽了。我不想给外交部拍电报告诉我的行期,人家看到我去了,自然会安排时间的。万一真的定下来叫我担任联邦总理秘书室的工作,一切将会麻烦得多,我就几乎不会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

列车隆隆向前,我几乎没有去注意沿途的车站。种种可能的设想在我脑海中翻腾:就算是叫我去绍姆堡宫见康拉德·阿登纳,怎么那么巧刚好是我呢?准是他们张冠李戴弄错人了。好吧,这一点反正很快就会见分晓的。这个基督教民主联盟实在聪明!它把自己取得的成就全部归之于康拉德·阿登纳一个人的身上,把他当成自己成绩的象征,当成一个看得见的具体标志。就连街头巷尾的普通人也知道:他投康拉德·阿登纳的票,那么他自己辛辛苦苦争取的、然而却又确实是那么迅速地重新获得的幸福就有了保障。基督教民主联盟从复杂的政治事态中得出了结论:一定要依靠普通人,依靠普通人的选票。那么怎样才能使普通人了解政治事态呢?这一点即使是专家们要想全部了解清楚也会有困难呀。简便的方法,莫过于树立一个象康拉德·阿登纳这样的象征来争取他们。上届竞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提出了“不进行试验”的口号^①。他们定然知道康拉德·阿登纳对他们的好处。德国的名字又有些值钱了。康拉德·阿登纳在纳粹统治时期始终清白,人们可以为他自豪,对内对外他都代表着善

^① 有关情况可参阅《阿登纳回忆录》中译本第3卷第10章第7节。
——译者

良正直的德国。每当日本问起我是哪国人，而我回答是德国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时，人家就表示完全熟悉，露出羡慕的神情和眼光说：“康拉德·阿登纳！”康拉德·阿登纳是一个象征，有其无法估量的作用。我想，聪明啊，基督教民主联盟！这样一位老人，早在1918年至1933年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在政治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当时他任科隆市长和普鲁士议会议长。有人曾经两次请他出任德国总理，他都予以谢绝。纳粹时期他被迫赋闲在家。1945年4月纳粹溃败之后，美国人请他出来再任科隆市长。同年10月，他被这时接替美国人占领科隆地区的英国人以“不称职”的罪名踢了出去，同时还禁止他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与纳粹时期完全一样。可他还是找到了门路，后于1949年出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联邦总理，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一职位。我算算现在他该有八十二岁了，人们都说，事事出自他一人之手，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什么领导国务呀！其中有何内情呢？什么负责政府的政策呀！谁是真正的负责者呢？什么权力中枢呀！实际上又是谁在行使权力呢？什么内阁民主呀！又是操在哪个领导集团成员之手呢？康拉德·阿登纳看来讲话干脆，平易近人，据说，人们都能理解他的话。我本人还未听过他讲话。他是个聪明、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是个喜爱讽刺、秉性猜疑的人，是只狡猾的狐狸，是个玩弄政治权术的老手。康拉德·阿登纳准定目中无人。现在他满可以过一种太太平平、恬淡寡欲的生活了，他有了足够的声望，可以体面地，即没有吃败仗的污点引退了。如此高龄还一直担任政府首脑，准有蹊跷之处。也许是基督教